

21 世纪贸易投资新议题系列读物

王新奎 姚为群 徐庆敏 主编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Maps and Policy Issues

全球价值链时代：
测算与政策问题

[葡]若昂·阿马多尔 [意]菲利波·迪毛罗 编著

João Amador and Filippo di Mauro

陶翔 倪炜瑜 张毅菁 杨莺歌 温一村 译

人民出版社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Maps and Policy Issues

全球价值链时代：
测算与政策问题

[葡]若昂·阿马多尔 [意]菲利波·迪毛罗 编著

João Amador and Filippo di Mauro

陶翔 倪炜瑜 张毅菁 杨莺歌 温一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价值链时代:测算与政策问题/(葡)若昂·阿马多尔(Joao Amador),(意)菲利波·迪毛罗(Filippo di Mauro)编著;王新奎,姚为群,徐庆敏主编;陶翔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21世纪贸易投资新议题系列读物)

书名原文: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Maps and Policy Issues

ISBN 978-7-208-14823-9

I. ①全… II. ①若… ②菲… ③王… ④姚… ⑤徐… ⑥陶… III. ①世界经济-研究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45846 号

责任编辑 熊 捷

封面设计 陈 楠

• 21 世纪贸易投资新议题系列读物 •

全球价值链时代:测算与政策问题

[葡]若昂·阿马多尔 [意]菲利波·迪毛罗 编著
王新奎 姚为群 徐庆敏 主编 陶翔等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153,000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4823-9/F·2494

定价 45.00 元

总 序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战后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分水岭。前一轮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大致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于 90 年代达到高潮,到 21 世纪前 10 年进入成熟期。制造业大规模生产技术,以及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是推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以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国家积极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拓展了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空间,以 GATT/WTO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和金融体制提供了这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市场规则基础。

在过去的 30 年中,全球价值链首先在美欧与东亚两大贸易区域间展开。目前,已形成以服务价值链为核心的北美—欧洲大贸易区域,以及以制造价值链为核心的东亚大贸易区域。通过全球性跨国公司依托美欧与东亚两大区域价值链的供应链布局,形成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融合服务价值链和制造价值链的全球价值链。

近 30 年来,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有以下几个特点:

与贸易相比,投资特别是服务业的投资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绝大部分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网络正日益朝着提供服务输入的方向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相关研究的统计,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总存量中超过 60% 是服务贸易投资(制造业与第一产业的投资仅占 26% 和 7%)。这一现象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中相似。^①

^① 《全球价值链与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增值贸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3 年 2 月。

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全球价值链中包含了大量的服务贸易。尽管服务贸易份额仅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20%,但在全球用于出口的输入增值中,服务贸易部门贡献了几乎一半(46%)。原因是制造业的产品出口需要大量的服务。^①

与以商业存在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服务业相比,以跨境交付为主要特征的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2 年,美国向欧盟出口的服务贸易中,约 72%(1 406 亿美元)是数字交付服务。从全球来看,2012 年美国出口的数字交付服务达 3 837 亿美元,占美国服务贸易总出口的 61%。如果将包含在货物出口中的数字交付服务也计算到美国的服务出口中,将会使美国的数字交付服务出口从 3 837 亿美元增长至 5 692 亿美元,相当于占美国总出口的 32%。对于欧盟而言,数字交付服务出口将从 4 650 亿美元增长至 7 488 亿美元,占欧盟总出口的 24.8%。^②

在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未雨绸缪,开始谋划如何对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进行重构。当前,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重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趋势性特点:

规则重构的平台转移。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平台已经从 WTO 多边贸易体制谈判平台转向以美欧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为代表的区域性贸易安排谈判平台。

规则重构的中心变化。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重心已经从货物贸易领域转向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服务贸易的领域;从贸易的边境措施领域转向投资的境内措施领域;从主要关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转向同时关注贸易和投资的公平化。同时,把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和道德标准等也纳入了贸易和投资规则谈判的范围。

规则重构的机制强化。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机制进一步强化,具

① 《全球价值链与发展:全球经济中的投资和增值贸易》,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3 年 2 月。

② 《跨境数据流动和互联网对美欧贸易与投资的影响》,《WTO 快讯》第 241 期。

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实体谈判越来越多地采取“负面清单”减让表方式,提高了承诺的透明度和约束力;二是越来越多地引进投资者对政府的争端解决机制安排,提高了对市场准入承诺的监督度和执行力。

经过近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崛起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体和第二大的经济体。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以上发展趋势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新型大国来说,如何积极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了解和适应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21 世纪新议题”,将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所面临的又一次重大挑战。

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为政府、企业和社会提供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相关决策咨询服务的专业机构,通过编辑出版《21 世纪贸易投资新议题系列读物》,组织相关专家编译、介绍重要国际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与 21 世纪新议题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我国的政府决策部门、企业界和学术界提供观察和研究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新趋势的基本路径和出发点。编辑出版类似的丛书一直是我们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我们将以最大的热忱和责任心,努力把这件工作做好。

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

理事长兼总裁

王新奎

2015-4-7

序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是对当今生产与贸易在地域上出现的分散化性质进行充分认识的唯一方式。全球价值链不仅将全球各地的企业与消费者联系起来,而且还会对国家和国际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也进而会影响到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了解推动全球价值链的因素及其发生的含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本书中,那些特约作者们讨论了许多这方面的内容,从全球价值链在欧元区的发展路径,一直到其对宏观经济冲击产生的传导效应。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简称CEPR)对于为本书的撰写成果付出巨大努力的若昂·阿马多尔(João Amador),以及贡献各种宝贵见解的特约作者们深表感谢。我们也要感谢编辑们在构思酝酿和完成本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并感谢查理·安德森(Charlie Anderson)、阿尼尔·夏姆达萨尼(Anil Shamdasani)和莎瑞雅·辛哈(Shreya Sinha)为该书出版和发行所做的努力。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承诺本书内容仅反映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与其所属机构的看法相一致。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在经济政策事务上也不持机构立场,并很高兴能就此话题提供一个观点交流的平台。

泰莎·奥格登(Tessa Ogden)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副主任

2015年7月

目 录

总序	1
序	1
导论	1

第一部分 全球价值链测算

第 1 章 欧元区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	13
第 2 章 全球价值链：“世界工厂”正在崛起	23
第 3 章 全球价值链中的专业化因素	33
第 4 章 一种基础网络视角	42
第 5 章 全球价值链中的网络与结构整合	52
第 6 章 全球价值网络	66

第二部分 全球价值链影响

第 7 章 全球价值链、劳动力市场与生产率	87
第 8 章 全球价值链与增加值贸易中的大崩溃	98
第 9 章 贸易与需求之间的联系纽带：全球价值链重要吗？	107
第 10 章 诠释全球市场份额的变化：增添全球价值链视角	121

2 全球价值链时代 测算与政策问题

第 11 章 关于贸易失衡的解释 133

第三部分 企业层面维度

第 12 章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 145

第 13 章 全球价值链与涉及金融摩擦的跨国活动 155

附录 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方法、概念与数据 167

导 论

若昂·阿马多尔^{*}

菲利波·迪毛罗^{**}

在经济政策的研讨中,当前对“竞争力”(Competitiveness)这一概念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宽泛且难以把握。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目前严重的全球失衡,一些经济体中极低的通货膨胀和普遍存在的高负债率,使得缓慢的增长前景成为经济关注的前沿问题。然而,在一个愈益全球化的世界里,经济增长与跨境经济关系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从微观经济角度来看,公司在寻求改善经济的表现中起着主导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过程的现代化组织以及进口对于成功出口商所起的作用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分析维度。于是,宏观和微观的视角共同促使国际贸易,特别是全球价值链成为“竞争力”探讨的中心话题。

在上述背景下,2012年3月,欧元体系建立了竞争力研究网络(CompNet),参与者包括欧盟国家中央银行以及对竞争力问题感兴趣的国际组织。CompNet旨在从全局着手,研究欧盟国家和公司的竞争驱动要素以及竞争力指标。在CompNet内部,其中的一项工作流程已经开始关注全球价值链,一系列精

^{*} 若昂·阿马多尔(João Amador),葡萄牙中央银行经济研究部金融政策与结构研究分部负责人;同时担任诺瓦经济工商学院的助理教授,讲授宏观经济政策与欧洲经济课程。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产品市场竞争、宏观经济学、欧洲一体化以及葡萄牙经济。他还是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竞争力研究网络(CompNet)工作流程方面的负责人,处理全球价值链事宜。

^{**} 菲利波·迪毛罗(Filippo di Mauro),任职于欧洲中央银行。

简版的结论性论文构成了本书的主干部分。简而言之,本书旨在促进全球价值链的政策性和学术性讨论,同时包括与其相关的测算和政策涵义。

全球价值链:定义和范围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简称 GVCs)——指的是国际生产网络中货物、投资、服务、专业技能和人群的跨境流量——已经逐步改变了这个世界。它们的出现导致按照参与者及其比较优势的世界贸易得到了彻底的重构。因此,为了评估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强弱和对经济政策的影响,从现在起就需要将生产流程的跨境维度纳入考量范围。

经济类文献中采用了多种不同的术语。有一种通用的定义,源自杜克大学的全球价值链研究计划(Global Value Chain Initiative),指出“全球价值链描述了产品或服务从最初概念到终端用途的全部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在地理空间和跨国边界上的分布情况”(DFAIT 2011,第 86 页)。国际贸易类文献则就这一现象使用了很多术语,包括“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sation)、“外包”(outsourcing)、“离岸”(offshoring)、“国际化生产”(internationalisation of production)、“国际生产分工”(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非一体化生产”(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多阶段生产”(multi-stage production)、“产品内部的专业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sation)、“生产迁移”(production relocation)、“价值链的分割”(slicing up the value chain)、“国际化生产分割”(international segmentation of production)。尽管如此,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者倾向于称之为“分散化”(fragmentation),这个词最初是由琼斯和凯克斯基(Jones & Kierzkowski, 1990)提出的。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上大多数货物与服务的生产范式。当前,生产已跨越不同国度呈现出垂直分散化的态势,即零部件在不同地点生产,随后或是沿着供应链的顺序或是在最后一个生产地点进行组装。全球价值链的运作网络非常复杂,涉及制造、物流、运输和其他服务行业的企业,还包括海关

人员和其他公共部门。供应链贸易是由投入成本、分拆成本和技术所共同决定的,这些因素也决定了生产的不同阶段是如何关联的。过去几十年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正不断提升,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2013 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所指出的,60%左右的全球贸易是由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所组成,然后这些会被归并到生产的不同阶段。全球价值链在世界经济中的普遍存在,会对贸易和劳动力市场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同时也会对诸如不平等、贫困和环境等问题造成影响。目前,即使是政策讨论中常用的诸如双边贸易平衡、出口市场份额或实际汇率等提供信息支持的测算方法,都要进行重新定义,以厘清贸易流量中体现出来的国内外增加值问题。

全球化生产的结构性变化:简要的历史插叙

有大量文献详细说明了生产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整合起来,以及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全球化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在过去几个世纪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过程,涉及贸易成本有规律地稳步下降。直到 19 世纪后期,产品的生产还是相当本地化的,其投入品、生产要素和市场之间的距离只有咫尺之遥。只是在“蒸汽革命”之后,铁路和汽船才开始被用于货物运输。由于规模经济的拓展,这才使得将过剩产品销售到其他地区成为可能,而且还有利可图。鲍德温(Baldwin, 2006)指出这是第一次“分拆”(unbundling),即这个过程使生产得以从消费中分离出来。交通运输革命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影响世界所有地区。它对北方国家(欧洲、北美和日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引发形成了一个能够实现生产和增长自我可持续性发展的循环周期,但是发展中国家并没能参与到工业化之中来。

这一交通运输革命虽然降低了贸易成本,并有利于规模化生产,但也导致了工厂和工业区域生产的本地化集群。生产的不同阶段在地理距离上的邻近,使得协调日益复杂的生产流程变得更加容易,同时还能使相关协调成本实现最小化。由于协调成本的关系,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距离上的邻

近”(proximity)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正因为这样,信息通信技术革命可以通过远距离协调复杂性,使得成本的降低成为可能。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大幅进步,不仅能够使消费从生产中分离出来,而且生产本身也能被分解。生产的不同阶段重新部署的可行性,理论上能使某个生产过程中的不同任务由地理上分散的生产单位所完成。这在国际贸易中被称为“二次分拆”,并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生产分工。

对某些生产阶段离岸外包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者工资之间的巨大差异。由于生产分工,发展中国家在多元化、工业化、经济增长与发展方面拥有了更广泛的选择。而先前只有基础设施功能完善和生产流程高效集成的国家,才能参与到全球经济中来。但现在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在生产流程某些阶段中的专长来加入到现有的全球供应链之中,典型的是最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相关讨论,参见 Baldwin, 2014)。制造业中的这些环节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促进了新兴市场的高速增长;同时,这一转移受旨在吸引国外资本的国内政策影响推动下,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其结果是“二次分拆”颠覆了之前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工业化/非工业化模式。这一命运式的改变是过去几十年影响最大的经济转型代表之一,它也重新塑造了国际关系和经济关系中的权力平衡,并将继续发挥作用。

投入产出矩阵和贸易增加值测算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扩展了投入产出矩阵的使用,使不同国家行业间相互依赖的影响能够得以处理解决。目前文献中出现两大主要流派。大量论文通过估算在生产或总投入中的直接进口投入份额来测算国内生产中的国外含量。费恩斯特和汉森(Feenstra & Hanson, 1996)最早提议使用这种测算方法并进行了相关计算,现已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同的公式之中。第二种文献流派的观点则是强调了出口中直接或间接的进口含量。这种测算方式在首

次由赫梅尔斯等人(Hummels et al., 2001)提出后即被贴上了“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sation)的标签,它适用于那些生产在两个或以上国家完成以及商品至少有两次跨境的情况。第二种方法的应用面相对较窄,因为它增加了一部分出口导致的产出情况,但是也因为它包括了间接用于出口生产中的进口投入而显得更为全面。

利用全球投入产出矩阵为全球价值链这种新的度量手段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支持。近期有文章将“垂直专业化”这一概念作了一般化推广,并且抓住了贸易中体现出的不同维度增加值。全球投入产出框架下对贸易增加值进行测算,最早是由约翰逊和诺格拉(Johnson & Noguera, 2012)、多丹等人(Daudin et al., 2011)以及库普曼等人(Koopman et al., 2014)展开研究的。

尽管近年来已取得了一些实质性进展,但投入产出表离可用性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其中大多数都包含了行业细分相当有限这一问题,使其无法达到充分解释实际生产过程复杂性的理想结果。此外,由于投入产出分析假设了固定的技术系数,且不允许投入之间的替代,因此对于所有部门,它都假设了按比例的和固定的规模收益。由巴特·洛斯和马塞尔·蒂默(Bart Los & Marcel Timmer)撰写的本书附录给出了全球投入产出矩阵的结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详细情况,这些内容被用在了部分章节的结论推导,同时也成为几个全球价值链指标计算的方法论基础。

本书的结构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里的各章从不同维度探讨了全球价值链的测算方法。最简便的方法是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进行计算,考察其随时间以及跨境和跨部门的演变情况。由若昂·阿马多尔、丽塔·卡帕列洛和罗伯特·斯特赫勒(João Amador, Rita Cappariello & Robert Stehrer)撰写的第1章首先关注的是增加值流量,并将欧元区视为一个整体,与其他大型贸易集团如美国、中国和日本进行比较。本章还观察了区域性联系,即欧元区内部

的增加值流量。此外,还对欧洲国家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进行了单独分析考察。本章发现,欧元区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越来越高,这点可以与其他主要世界经济集团相媲美。分析还显示,欧元区仍然是其大部分成员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地。

有一种密切相关的方法,是对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形式呈区域性还是全球性进行评价。由巴特·洛斯、马塞尔·蒂默和盖泽·德弗里斯(Bart Los, Marcel Timmer & Gaaitzen de Vries)撰写的第2章得出的结论是,自2003年以来价值链本质上已经变得相当程度的全球化了。产品价值中越来越多的份额被生产完成国所在地以外的区域所占有。像“欧洲工厂”这样的区域集团仍然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世界工厂”的建设正在迅速发展。

还有一种补充性的分析方法,是从所使用的投入及其成本角度来观察全球价值链。由巴特·洛斯、罗伯特·斯特赫勒、马塞尔·蒂默和盖泽·德弗里斯(Bart Los, Marcel Timmer, Robert Stehrer & Gaaitzen de Vries)撰写的第3章则对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内容以及资本与不同劳动资质的报酬占比进行了考察。调查结果揭示,成熟经济体中的企业将其非技能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转移到低工资国家,同时把战略型和高附加值职能的生产活动集中在国内,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方便获得所需的技能型工人和无形资产。

另一种类型的测算是借助网络理论,侧重于用可视化的形式来表示各国之间增加值流量随时间的主要联系。由若昂·阿马多尔和索尼娅·卡布拉尔(João Amador & Sónia Cabral)撰写的第4章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其中证实了大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其区域性维度仍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正逐渐让位于日益全球化的网络。此外,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超过了服务业。分析也指出,在国家层面,德国和美国仍然是核心角色,但中国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

由吉安卢卡·桑托尼和达利亚·塔格里奥尼(Gianluca Santoni & Daria Taglioni)撰写的第5章则从全球价值链的进入和升级角度入手,并将网络计量指标同其他解释变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该章表明,与供应方的良好整合

能反过来推进全球价值链的较好整合,这一点对于出口绩效和出口中体现的增加值方面最为重要。另一个结论是,技术与增加值的主要中心集中在日本、美国、德国/欧盟,而韩国和中国更多地还是处于外围区域。

最后,全球价值链的测算结果也与跨国公司和国际商业集团之间建立的关系相一致。在卡洛·阿尔托蒙特、伊塔洛·科兰托内、阿曼多·伦吉和托马索·松诺(Carlo Altomonte, Italo Colantone, Armando Rungi & Tommaso Sonno)撰写的第6章中,构建了一个跨国集团的数据集,用以调查商业集团的选址决定及其特点与增加值流量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双边国家/行业层面的跨国商业集团布设,往往与贸易增加值流量有着很强的相关性。

本书的第二部分转向了全球价值链对若干经济层面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对于经济学家阐释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式以及对最终经济政策的决定,其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极具挑战性。例如,类似显性比较优势和实际有效汇率等指标,通常是基于贸易总值的测算而言的。然而,“原产国”这一概念越来越难以适用,因为各种生产经营活动已经遍布全世界。事实上,一个国家可能是某种特定商品的出口大国(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而言),但却并没有在生产方面贡献太多增加值。因此,分析一个国家的出口潜力、竞争力和劳动力市场发展,就需要考虑其在全球价值链之中的整合情况。

由若昂·阿马多尔和索尼娅·卡布拉尔(João Amador & Sónia Cabral)撰写的第7章,就全球价值链对就业、工资和生产率的影响开展了广泛的实证调研。研究发现,外包业务的兴起,部分原因是与发达国家对技能型工人的相对需求增长有关。此外,对于就业水平的整体效应而言,行业层面的数字虽然看起来很小,但却掩盖了不同技能类别和单个企业之间的差异。就生产率来看,尽管到目前为止,在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中只寻求到微弱的证据,但使用行业层面数据的研究却趋于表明,离岸外包对生产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全球价值链会对宏观经济冲击的幅度和国际传导产生影响。在此期间,全球贸易在世界各地同步出现了严重的下滑,尤其是资本和中间产品的贸易更为显著。虽然有几类传导机制在起着作用,但

是对于一些市场中最初出现的一种需求冲击以及严重的信贷短缺的传导,全球价值链似乎发挥了主要作用。由阿恩·纳根加斯特和罗伯特·斯特赫勒(Arne Nagengast & Robert Stehrer)撰写的第8章表明,垂直专业化的变化在金融危机期间促使增加值贸易呈现出大幅下降,同时也强调了最终需求构成变化的重要性。此外,与总出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都因为增加值贸易的大幅下滑而受到强烈影响。

全球价值链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同样也改变了贸易流量与总体宏观经济态势之间的关系,并对传统的宏观经济模型构成了挑战。在第9章中,亚历山大·阿里·哈希姆、弗劳克·斯古德林、埃琳娜·瓦卡里诺和朱莉娅·沃尔兹(Alexander Al-Haschimi, Frauke Skudelny, Elena Vaccarino & Julia Wörz)重点讨论了全球价值链对于全球贸易收入弹性的重要性,并通过测量全球价值链的整合度来扩展对进口需求函数的估计。结果显示,新兴经济体的需求弹性往往高于发达经济体。此外,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随着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增强,进口需求的反应也会愈加强烈。

在第10章中,康斯坦丁·本可夫斯基和朱莉娅·沃尔兹(Konstantins Benkovskis & Julia Wörz)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对全球市场份额的影响——这是一个通常与外部表现有关的经典宏观经济变量。该章的研究结论是,关注点从传统总出口转移到出口市场份额中的增加值,并不会改变欧盟新成员国以老成员国为代价来换取市场份额的结果。但是,对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核算表明,价格因素在解释类似改变时更为重要。此外,尽管有证据表明欧盟新成员国在生产的相对质量上有所赶超,但其出口相对质量上的改善常常还是归功于外包过程。

全球价值链的普遍现象对诠释全球失衡问题也有重要影响。对中间投入贸易的核算并不能改变单个国家与世界其余地区的总体贸易平衡问题。尽管如此,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就意味着对伙伴国之间的贸易顺差(surpluses)和逆差(deficits)的再分配。在用总值(gross)衡量双边贸易平衡时,最终商品出口国的逆差可能会被夸大,因为它会受到来自第三国提供给该出口国的投